



盖斯凯尔小说中的 维多利亚精神

Victorianism in the Novels of Elizabeth Gaskell

陈礼珍 著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

陈礼珍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陈礼珍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769-3

I. ①盖… II. ①陈… III. ①盖斯凯尔, E. (1810~
1865)—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43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

陈礼珍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769-3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¼

定价: 39.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化领导权之战:盖斯凯尔与英国 19 世纪前期的 去浪漫化潮流	9
第一节 《路得》的兆象:始于摄政时代的去浪漫化潮流	11
第二节 《爱丁堡评论》:文化反击战的一个片段	15
第三节 反浪漫主义思潮与文化秩序重建: 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争	23
第四节 顺流与逆流:盖斯凯尔的浪漫主义理念	33
第二章 道德领域的光芒与暗角:《路得》的多重隐喻和意义迷踪	42
第一节 《路得》与《圣经》的互文性:被遮蔽的潜文本	43
第二节 《路得》与“堕落女子”问题	46
第三节 瘟疫的隐喻:《路得》的自由主义批判	49
第四节 想象的陷阱:《路得》与南丁格尔	63
第三章 维多利亚人的性别政治景象:从《克兰福德镇》到 《妻子与女儿》	73
第一节 《克兰福德镇》的思想之战:约翰逊与狄更斯 文学理念中的文化动因	73
第二节 女子欲望与男性气质:解读《克兰福德镇》的生活细节	83
第三节 想象的危险和欲望的压抑:《克兰福德镇》 癔症与暗恐分析	88
第四节 并不稳固的女性乌托邦:叙述声音的分裂	97
第五节 视线交织的圆形监狱:《妻子与女儿》的道德驱魔仪式	101
第四章 《北方与南方》和《西尔维娅的恋人》:达尔文主义思想 源脉批判	113
第一节 盖斯凯尔与达尔文主义思想渊源	114
第二节 自由意志的幻觉:玛格丽特在关键场景的抉择	119

第三节 约翰的抉择: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	126
第四节 《西尔维娅的恋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134
第五章 日常生活中的帝国情结:《玛丽·巴顿》与《克兰福德镇》	143
第一节 “机械降神”与帝国情结:对三部小说类似结尾 模式的反思	145
第二节 蝎子与鸦片的政治讽喻:《玛丽·巴顿》的殖民与 阶级隐喻话语	151
第三节 作为文化塑形力量的浪子:《克兰福德镇》的帝国 图景分析	159
第四节 流言的政治符码: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在 19 世纪中期的 文学先声	167
结语	178
附录一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重新崛起	184
附录二 21 世纪以来国外盖斯凯尔研究的流变与发展	188
附录三 盖斯凯尔生平与作品年表	200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20

绪 论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英国历史上的宏伟篇章,见证了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加速崛起、繁荣鼎盛与逐渐衰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大英帝国始终在追寻光荣与梦想,然而危机和焦虑时刻都如影相随。1832年的《改革法案》已经率先迈出了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一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6月20日继位时,英国社会正面临着重重危机:经济衰退、思维僵化、信仰动摇、阶级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扩大、民族问题恶化、拜金主义泛滥等问题造成的不稳定因素袭扰着英国人。在困难中不断前行的维多利亚人展示出与之前摄政时期不同的生活态度,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风格与面貌通常被称为“维多利亚精神”(Victorianism)^①。批评界对“维多利亚精神”做出各种解读,通常将它描述为“虚伪、肤浅、假正经、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② 细绎这种观点的主旨,可以发现它的基本立场是对维多利亚人的生活方式持有否定性的评价。究其原因,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已经终结、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兴起之后,人们用回溯眼光与逆反心理所做的价值判断,这种脱离历史现场和文化语境的论断无法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嫌疑。除此之外,学界之所以倾向于用否定的方式来阐述“维多利亚精神”,或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个概念实在难以厘清。

“维多利亚精神”一词所涵盖的语意范围非常广泛,很难抽取出一个本质性的定义,因此学界一直没有对它的确切定义达成一致意见。^③ “维多利亚精神”这个概念最早由一些对此种文化气象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所创造,带有贬义,后来才逐渐转向中性。“维多利亚精神”通常以相对的意义形式出现,同之前的浪漫主义文化和之后的现代主义文化都存在显著差异,正是这

① 中国学界对此并无固定译法,又译为“维多利亚风尚”或“维多利亚习气”等。

② Henry S. Pancoast, 1926: “Victorianism and Its Critics”, *The Sewanee Review*, 34, 1, 33.

③ 参见 Jerome Hamilton Buckley, 1951: *The Victorian Temper: A Study in Literary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

种对比和差异对它产生了界定性的意义。笔者认为,“维多利亚精神”反映了英国社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状态,表征那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文化风貌,体现了维多利亚人普遍认可并遵循的道德规范与价值取向,同时它又以集体意识的形式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国民的言行举止进行引导和约束。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黑格尔等人就从哲学角度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精神风貌进行思辨与评估,并提出类似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概念。黑格尔的“时代精神”侧重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的哲思色彩,指称当时社会的主流知识和思维范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是历史发展演变的推动力量。随着德意志民族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崛起,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和古典哲学在英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皆知,英国批评家威廉·海兹利特在1825年出版的散文集《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对英国浪漫主义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的多名杰出人物做了臧否,将他们视为引领当时英国时代精神的文化偶像。不久之后的1831年,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也发表了同样以《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命名的文章,他笔下的时代精神捕捉的是“过渡的时代和理智的无序状态”。^①此时的英国已经处在新旧两个时代的接缝处:摄政时期^②已经结束,维多利亚时代即将开始。

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通常会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界定性特征,马里诺夫斯基(Malinowsky)称之为“社会纲领”(charter of the society),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称之为“范式化经验”(paradigmatic experiences)。^③维多利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创了新的局面,同时也激发了新的社会潮流。“维多利亚精神”体现了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时代精神,很大程度上迥异于之前的摄政时期的文化风貌。“维多利亚精神”不仅是时代精神面貌的抽象概括,同时还潜藏了诸多生活细节,凝缩成为一种文化存在形态,蕴含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生活态度和道德规范。不管批评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文化整体精神风貌做出何种界定,它体现出的都是

① Gertrude Himmelfarb, 2007: *The Spirit of the Age: Victorian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

② 狭义的英国“摄政时期”通常指1811年至1820年间,乔治三世因健康问题由儿子(后来的乔治四世)代理政务。广义的“摄政时期”通常指1800年至1830年间,乔治四世个人品位深刻影响英国文化的历史时期。本书所用为广义概念。参见Roger Sales, 1996: *Jane Austen and Representations of Regency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xv.

③ 转引自Michael Timko, 1975: “The Victorianism in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The New Literary History*, 6, 3: 609.

维多利亚人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化解焦虑而表现出来的集体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因此它表现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取向。^①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文化对工业化、民主、阶级等一系列重要社会力量的历史变迁产生联动作用,它“曾被用来表示思想的状态或习惯,或者思维与道德活动的主体,现在则表示所有生活方式的总和”。^②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维多利亚精神”实质上表征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整体文化气象。

文化在不同社会力量的冲突过程中发展和定型,维多利亚精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历史范畴,其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雷蒙·威廉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文化:主流、残存与萌芽状态。^③在“维多利亚精神”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就文学维度而言,卡莱尔、纽曼、阿诺德、穆勒、罗斯金、莫里斯和佩特等批评家从道德和政治批评角度直接丰富和推动了维多利亚精神的塑造;同时,一大批作家也通过自己的文学虚构叙事反映和参与了维多利亚精神的塑形过程。布兰特林格(Patrick Brantlinger)认为:“维多利亚小说史比得过社会科学史。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甚至特罗洛普和萨克雷——勾勒的有关人性和社会的典型形象在许多方面也在政府蓝皮书中得到了展现,换句话说,维多利亚小说志在获得蓝皮书的地位……”^④布兰特林格指出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1810~1865)等小说家在表现维多利亚精神方面的巨大贡献。盖斯凯尔^⑤秉承的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正统理念,意图以小说虚构叙事“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使之具有类似于史书的功能。盖斯凯尔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玛丽·巴顿》蜚声文坛,后来又写作了一系列描述维多利亚人日常生活场景的现实主义风格小说。在2002年出版的《牛津英国文学史:维多利亚人》分卷中,菲利普·戴维斯打破以往文学史编撰中常见的以传统文学声誉论资排辈的做法,将盖斯凯尔的作品视为现实主义写作的标杆,称她的作品为“高度现实主义”(high realism)的

① 参见殷企平:《文化》,《外国文学》,2010年第5期,第73~83页。

② Raymond Williams, 1959: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Anchor Book, pp. xvi~xvii.

③ 参见 Raymond Williams,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1~127.

④ 转引自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一版,第14页。

⑤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一直都被称为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盖斯凯尔学会”(the Gaskell Society)已经达成共识,倾向于在研究著述中直接用“盖斯凯尔”称呼她。

代表。^① 戴维斯采取的文学史叙事方法为提升盖斯凯尔的历史地位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分析盖斯凯尔小说虚构叙事与维多利亚精神之间的关系时似乎仍然局限在“文学反映现实”的认识论陷阱之中。其实文学不仅反映社会现实,作为一种话语构成,它还以文化力量的方式参与社会现实的塑形过程。任何文学思潮的产生背后都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推动力量,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集团赖以行使和维持其统治权力的假定。”^②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时代文化风尚的形成并不只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单方面引导所能控制的结果,还有来自民间文化力量的声张与反抗,多个社会利益集团都参与其中,它们所引导的社会力量不断冲突、斗争、妥协与融合,交汇形成具有基本稳定形态的维多利亚特色生活方式。

进入19世纪后,英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都向纵深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张,而政治体制的发展却有滞后,由此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改革呼声日益高涨。英王乔治四世统治末期疏于朝政,在民怨沸腾中去世。继位的威廉四世性格温良平和,在其治下,英国正式拉开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威廉四世继位初年(1830年),辉格党人查尔斯·格雷上台组阁,旋即开始推行影响深远的选举体制改革,在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与扩张资产阶级的权力。待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到来,各项改革配套措施都有了持续不断的实质推进。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文学不仅继续秉持教化民风的责任,而且变得愈发雄心勃勃,试图在文学虚构话语中写实地呈现出英国社会存在的矛盾与阴暗面,以期唤起民众的改革意识,从而发挥倒逼政府加快改革步伐的功效。萨克雷于1851年2月22日在《喷趣》(*Punch*)杂志上说过“作品中没有抱负(purpose)的小说家在如今世道下一无是处”^③,此语略带夸张和讥讽,却透露出文坛风气的实情。马克思赞赏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家所秉持的写作态度以及他们意在批判现实与改造现实的社会责任感。早在1854年的《英国资产阶级》一文

① Philip Davis, 2007: *The Victori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144.

②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18页。

③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51: “A Plan for a Prize Novel”, *Punch*, 22th February, Vol. 20, p. 75.

中,马克思就说“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等人是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①马克思的这段评语已为学界熟知,他在文中关注的重心是盖斯凯尔等人的小说对英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忠实而细致的描写。

就维多利亚时代众多作家的共同写作诉求而言,不妨套用一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结尾处做的那个著名论断:“其实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作品不仅可以反映与解释世界,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②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出版业已经高度发达,受众广泛,是民众获取信息与娱乐消遣的主要渠道。安东尼·特罗洛普在1870年《论作为全民娱乐消遣的英语散文小说》的演说中不无骄傲地说道,此时的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读小说的民族”。^③在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不仅是文学产业中的重要一环,而且还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和商榷社会问题,利用文学期刊和流通图书馆等出版发行平台赋予自己的话语权关注社会矛盾,发出改革呼吁,积极参与到英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是英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历史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推动与塑形力量。“社会问题小说”与“英格兰状况小说”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异军突起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盖斯凯尔文学事业的勃兴恰恰正在此时。

本书从文化研究与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出发,以文本与历史的循环意义作为立足点,揭示盖斯凯尔小说虚构叙事与维多利亚精神的互动,关注其在话语层面如何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形成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价值观。盖斯凯尔不仅通过自己的小说虚构叙事传承了维多利亚精神,更重要的是,又以自身的文学生产实践参与到英国社会旷日持久的文化领导权争夺战之中。盖斯凯尔的小说叙事反思、批判和推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形成的新时期社会文化观,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构造组成部分。

维多利亚时代既是大繁荣时代,又是充满变革的时代。就盖斯凯尔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而言,政坛的主基调是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经济上是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的如火如荼,在思想领域占据维多利亚社会主流的是功利主义,在宗教维度最为醒目的事件是试图对英国国教进行改革的“牛津运动”(1833~1845),在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686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6页。

③ Anthony Trollope, 1938: *Four Lectures*, London: Constable, p. 108. 参见 Philip Davis, 2007: *The Victori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226。

德与性别方面最深入人心的法则用“绅士”与“淑女”观念进行规训与塑形,在科学领域最具冲击力的理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1859),在国际关系事务中最显著的成就则是“日不落帝国”的强势崛起……维多利亚社会形态本身就情况复杂闻名,而且它在不同年代又一直发展变化,因此“维多利亚精神”并非一个内容明晰的客体,而更像是一个并无固定疆界的文化地带。本书所做的仅仅是指出几条得以接近这个地带的主要路径而已。本书将围绕上述话题展开研究,但在具体分析时不会一成不变地将它们作为各章节的中心。盖斯凯尔在自己的主要作品中并没有面面俱到地涉及这些内容,笔者所做的是在尊重原著面貌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解读,对小说文本进行局部的精描细写与深化论述,试图从盖斯凯尔小说的文字枝节中管窥到维多利亚精神风貌。

纳入本书研究范围的是盖斯凯尔最重要的六部小说虚构叙事作品(包括五部长篇和一部中篇小说)。本书将以主题作为引导,从不同维度切入讨论这些作品所承载的维多利亚精神。全书主体内容部分安排如下。

第一章将盖斯凯尔的小说虚构叙事放置在维多利亚文化的去浪漫化潮流中进行考察,讨论她在小说中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传承和改写。维多利亚小说以自身文学生产实践参与到文化领导权争夺战之中,成为英国社会现代化与资本化历史进程的构造组成部分。通过操控英国19世纪前期的主流文化与文学评论话语,资产阶级按照本阶级的兴味塑造了盖斯凯尔等年轻一代英国人的审美形态,使他们自觉开始去浪漫化行动。盖斯凯尔在《路得》前后两个部分中对女主角的浪漫化与去浪漫化塑造行为折射出英国思想界在19世纪上半期去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大文化战役——英德两国浪漫主义观念之争。《玛丽·巴顿》和《路得》等作品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理念进行的小说化改写。英国资产阶级完成对本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批判与扬弃是漫长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是整体的秩序,然而具体到特定个体,它又会呈现出相对的无序,这种有序中的无序恰好证明了整体秩序力量的强大。

第二章以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光芒与暗角为主题,统摄维多利亚精神的三大重要维度:宗教问题、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路得》的隐喻结构进行深入解读,进而追寻这部作品的文学虚构叙事和维多利亚文化叙事之间的断裂所造成的意义迷踪。本章从小说名字来源和中文译名说起,剖析它与《圣经》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路得》的斑疹伤寒瘟疫在宗教、文化、阶级和民族问题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隐喻意义,瘟疫场景透露出维多利亚时

代自由主义思想信奉者无法摆脱的内在矛盾。盖斯凯尔对小说结尾细节的处理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当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的个体主义情结与功利主义原则发生冲突时,盖斯凯尔从道德正义的角度选择了后者。本章还试图厘清盖斯凯尔及其《路得》与南丁格尔文化叙事传奇之间的关系,揭示西方学界将历史进行文本化阐释所造成的想象陷阱,指出《路得》实际上并未对南丁格尔的护理事业施加明显影响,它所起的建设性作用在于帮助弥合了盖斯凯尔和南丁格尔之间日渐疏远的友谊。

第三章探讨维多利亚精神在性别政治范围内的表征,指出《克兰福德镇》中约翰逊和狄更斯的思想之战代表的并非两股截然相反的文化力量,而只是同一种性别政治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外化形式。玛蒂姐妹等人的生活细节反映出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在欲望问题上自我压抑与释放的矛盾情形。入侵克兰福德镇的强盗成了一个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复影,象征着女人们被压抑的恐惧,以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非家幻觉”在暗中发生作用,并在她们身上产生不适的惊恐情绪。《克兰福德镇》存在故事层与话语层的对抗,它产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叙述者玛丽·史密斯与女性社区之间既融合又对峙的姿态,属于女性乌托邦的集体型叙述力量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成形。盖斯凯尔的最后一部作品《妻子与女儿》中描述了一个道德驱魔仪式,哈瑞特小姐通过故意将自己和莫莉的身体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中,利用公众视线的力量驱除依附在莫莉身上的道德流言的幽灵,恢复她的淑女声誉。《妻子与女儿》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如何生活在视线交织的圆形监狱中,她们的身体成为各种权力的斗争场所,在视线与女性身体之后潜藏着一幅由多重权力构成的冲突图景。

第四章研究对维多利亚中晚期文化精神产生全新冲击力与重要塑形作用的达尔文主义思想源脉。盖斯凯尔与达尔文思想有密切的渊源,她早在《北方与南方》中就涉及达尔文所言的自由意志的幻觉问题:女主角玛格丽特在关键场景的自主抉择使她用自由意志克服了阶级与生长环境带来的局限性,然而后来她又回归到维多利亚淑女“家庭天使”的常态,玛格丽特的抉择和转变表达了维多利亚人在自由意志维度的重重道德思量。《北方与南方》还讨论了男主角约翰在事业面临破产时肩负的道德责任,他在破产之际拒绝冒险使用借贷资金参加投机生意,这种个人抉择展示出自由意志的强大存在,但文本世界背后潜藏的种种隐情同样也表现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深层次复杂关系。盖斯凯尔在《西尔维娅的恋人》中旗帜更为鲜明地讨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情节的总体走向上,将个人性格与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用极端的情景展示并批判了西尔维娅的两个恋人在求偶与生

存的激烈竞争中如何让欲望决定选择,让本能蒙蔽道德。但是盖斯凯尔并没有通过直接鞭挞与讽刺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严肃感,而是对二者施以同情笔触,让他们最终获得道德忏悔。

第五章分析盖斯凯尔小说叙事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帝国情结问题。盖斯凯尔三部最有代表性的小说《玛丽·巴顿》、《克兰福德镇》、《妻子与女儿》都以“机械降神”的模式结尾,引入海外殖民的情节。这种有意识的重复行为说明她对此已经形成依赖心理。然而这种方法只能在微观层面解决社会个体成员的困境,无法在整体层面缓解或解决社会矛盾。约伯收藏稀有昆虫的爱好以及约翰·巴顿吸食鸦片的嗜好,暴露出英国工人阶级自身在“家政管理”方面也存在不可否认的过错。本章还分析了以彼得为代表的浪子在帝国殖民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浪子天性使然的离经叛道精神和放荡不羁性格可以视为对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的叛逆,是对其被压抑欲望的另一种复现形式。浪子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使得他们成为大英帝国殖民事业的重要推力,以切实的力量参与了维多利亚文化精神的塑形过程。《克兰福德镇》有一则关于浪子彼得成为西藏达赖喇嘛的流言,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文本细节表现出宗教与政治的冲突,文字符号间透露出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则流言背后潜藏的是大英帝国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日益迫切的吞并西藏的图谋,可以被视为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侵略西藏战争在文学领域的舆论先兆。

结语部分追溯了盖斯凯尔写作生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重合与缺失,指明通过盖斯凯尔作品把握维多利亚精神的可行性及局限所在。另外,该部分还补充说明了本书的理念架构与撰写思路。

另外,本书在附录部分论述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文学声誉在近年的重新崛起以及21世纪以来国外盖斯凯尔研究的流变与发展,希望简要勾勒出盖斯凯尔研究的最新动态。

书末还有关于盖斯凯尔生平与作品年表的附录。

第一章 文化领导权之战：盖斯凯尔与英国 19 世纪前期的去浪漫化潮流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通常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然而她的童年与青年时代却是在摄政时期度过的，当时浪漫主义思潮在英国风头正劲。浪漫主义文学不仅培养了她的文学阅读能力，而且激发了她的写作欲望。她的早期作品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后期作品则表现出对浪漫主义的磋商与规避。因此盖斯凯尔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批判问题一直都吸引着批评界的注意，近年来更是成为西方盖斯凯尔研究界的热点话题。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文学生涯是在丈夫威廉·盖斯凯尔的鼓励下开始的，他们俩在 1837 年 1 月合作发表了第一首诗歌《清贫绘》（“Sketches Among the Poor”），无论主题还是措辞都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威廉·盖斯凯尔在 1839 年匿名发表的诗歌集《克己歌》（*Temperance Rhymes*）也是对华兹华斯诗歌风格的模仿，甚至还得到过这位湖畔派诗人的书面嘉奖。^① 盖斯凯尔在写作生涯的不同阶段对浪漫主义文化做出不同回应。她的早期作品《玛丽·巴顿》和《北方与南方》为生活抹上理想色彩，在描绘工业社会苦痛现状的同时又对个体情感与阶级对立进行诗意化与抒情化处理，《路得》展示出她对浪漫主义传统的传承与改写，《克兰福德镇》则在怀念旧式生活方式的同时使用反讽手法以表达出这种方式日渐衰微的必然性，到了《西尔维娅的恋人》，盖斯凯尔的价值判断已渐趋客观与冷静，等到最后一部小说《妻子与女儿》，她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乡村生活，但此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祛魅，专注于描写乡绅与平民世界里平凡而难免无奈的人生现实。

盖斯凯尔在写作生涯后期的《同母异父兄弟》（*The Half Brothers*, 1859）和《妻子与女儿》等作品中将视野拓展到英格兰西北部边境和非洲内

^① Jenny Uglow, 1993; *Elizabeth Gaskell: A Habit of Stories*, London: Farber and Farber, p. 114.

陆,那里自然环境恶劣,已经完全不同早期作品对和谐自然的向往,消去了浪漫派概念中自然的审美功能与净化作用。故事世界的人物不会再从主体与审美的角度看待自然,而是将其处理为被异化的外部他者。这些作品中的自然已经摆脱浪漫主义意义上的清新、灵感与诗意属性,要么退化成危及健康或者残酷夺取生命的荒蛮存在物,要么转化成有待科学探索与征服的客体,全然不见早期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带有神秘与超验倾向的密切交流。

盖斯凯尔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继承与批判问题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路得》中体现得最为典型,这是她对浪漫主义文学遗产进行清点的转折点。下面让我们从《路得》入手,分析盖斯凯尔在这部小说中对浪漫主义进行传承与改写过程中存在的复杂境况,借此洞见英国在19世纪前期掀起的去浪漫化潮流。

《路得》开篇直接切入描写晦暗的街道、狭窄的房子、寒冷的夜晚以及疲惫不堪的缝纫女工,烘托出阴郁的背景,盖斯凯尔似乎还在继续《玛丽·巴顿》描写城市劳工阶层苦楚生活场景的写实风格,直到路得的突然出现。在盖斯凯尔笔下,路得表现出超脱周围环境与人物的性格气象,与那些早已被劳累磨去棱角的女工相比,刚入行不久的她对生活显然还保留了很多幻想:工作时特意挑了房间里一个最冷最暗的角落,就是为了看对面镶板上年代久远的绘画;听到小憩的号令别人都趁机打盹、烤火、活动筋骨或者表情麻木地吃着点心,只有她“蹦”到窗前,贴在窗玻璃上看外面的雪景,而且对着松树、草坪、街道与天空发一番物是人非的慨叹,甚至还有包起头巾冲到外面“一览美景”的冲动。^①对于那些寒冬熬夜受冻的缝纫女工们来说,她们显然无心欣赏如此美景,那样的夜晚只是“寒冷而凄凉”的时光,使她们的“咳嗽加重,身体变得越发酸痛”。(6)路得生性厌恶室内的逼仄空间,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喜欢外出呼吸新鲜空气,(5~6)对云、山、雨等自然现象和景观有种永不厌倦的好奇与热爱。(65)年轻的路得被刻画成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极度热爱自然、崇尚艺术、追求自由的女孩,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与周围平庸的女工、唯利是图的小作坊主以及破败的居住环境氛围格格不入。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却发现这些浪漫情怀竟然是将路得引向堕落之路的内在动因。更值得深思的是,路得后来隐姓埋名生活

^① Elizabeth Gaskell, 1910: *Ruth*,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5. 译文为笔者所译,亦参考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露丝》,筱璋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单词和引文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在小镇埃克莱斯顿，她在那里进行自我道德救赎的过程中却基本弃绝了之前的浪漫性格，可是小说结尾部分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照顾感染斑疹伤寒瘟疫的病人，最终染病去世，她的行动却似乎又具有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路得亲近自然的行动真的符合浪漫主义理念范式吗？盖斯凯尔为什么会对浪漫主义抱有难以取舍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又透露出维多利亚社会的何种政治与文化焦虑？笔者将从维多利亚时代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出发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第一节 《路得》的兆象：始于摄政时代的去浪漫化潮流

在 20 世纪后半期开始重估盖斯凯尔文学地位的过程中，西方批评界已经重新梳理了盖斯凯尔对浪漫主义文学理念遗产的继承及其在此问题上的复杂态度，取得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但这些评论基本都将盖斯凯尔对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反思局限在华兹华斯所引领的英国本土支脉，似乎没有意识到卡莱尔等文学巨擘在摄政时期与维多利亚时代推崇德国浪漫派^①和贬斥英国浪漫派的批评实践对盖斯凯尔的巨大影响。笔者认为正是这种阐释视角的局限性才会使批评界在分析盖斯凯尔作品的浪漫主义因素问题上留下不少悬疑。

《路得》在这一事件前后叙事风格以及对待浪漫化问题态度的突变引起了批评界的极大兴趣。在所有从浪漫主义角度分析《路得》的研究中，希拉里·绍尔的论述最全面也最有洞察力。绍尔系统分析了这部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认为路得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女主角”，是“华兹华斯式的大自然的女儿”，而“这一点恰恰导致她的堕落”，这是盖斯凯尔对浪漫主义关于不谙世事的女性情感以及自然美等诗学理念的“坦率批评”。^②绍尔主要从小说情节与女性作家寻求表达叙述权威等角度探讨《路得》的诸多不连贯之处，^③她认为华兹华斯模式的叙述者过于“专注于揭示卑微生活中的‘悲剧诗歌’”，小说的叙述形式无法驾驭类型化的故事题材，因而造成叙

① 德国浪漫派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包括早期浪漫派（约 1797～1810 年）和青年浪漫派（约 1810～1820 年），它们的思想有延续性但也有很多变化。为行文方便，本书不作区分，统称为德国浪漫派。

② Hilary M. Schor, 1992: *Scheherezade in the Marketplace: 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60, p. 67.

③ 同上, p. 78.